

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再考辨

李 虹

提 要：通行道教史认为丘处机身后全真教掌教为尹志平，继尹志平掌教者乃李志常。但细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垣《道家金石略》及金元时期道家文献，在丘处机和尹志平中间，尚有一位仅当过几十天掌教的过渡性人物宋道安。考察丘处机去世前心态，可知他心中默定的继承人是尹志平，由宋道安暂领教门事是丘处机一时的不得已之举。据此可以了解燕京时期丘处机与尹志平对教团发展的分歧，理解李志常时代全真教迅速走向衰败的原因。

李虹，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全真教 嗣教宗师 尹志平 李志常

全真教在金代成为北方不可替代的显教，金元之际更是进入鼎盛期，此中原因除教内高道努力外，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礼遇以及由此带给全真教的种种特权对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尹志平与李志常在丘处机去世后相继接任掌教之职，成为第六代和第七代宗师^①，全真教一时间显赫无比。关于元初全真教掌教宗师的顺序，清人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今人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姚从吾《元丘处机年谱》皆作如是观，通行道教史也多持此说^②。但细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垣《道家金石略》所收全真教碑铭，在丘处机和尹志平中间，尚有一位仅当过几十天掌教的过渡性人物宋道安。只是由于宋道安在位时短，不曾行过掌教继位之典，故被后世忽略。

关于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研究，学界着墨不多，常一笔带过，近年来有研究者对此问题多所探讨，如张广保《尹志平学案》、《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研究》、刘晓《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谜》认为宋道安是在尹志平压力下被迫以老迈为由逊位，实有违丘处机本意，故尹志平承位后只得以丘处机六封手札压服道众^③。上述几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有所发覆，但犹有余意，故此再做申述。

一、西行弘教：西行前之尹志平与李志常

关于尹志平和李志常生平，金元全真教史和金石碑铭中都有不少记载，资料较为丰富，但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记录和碑刻资料不是出自全真教门人之手，就是出自与全真教有密切关系的人笔下，字里行间难免会有过誉甚至不实之嫌，其局限性自不待言。

尹志平与李志常是全真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同为丘处机的弟子，均为西行的参与者。惟其不同的是，

尹志平陪同丘处机走完全程，李志常则因教团内部事务留阿不罕山^④。由此可见，当时的李志常尚未处于核心圈。

尹志平，字太和，号清和，山东莱州人，生于金大定九年（1169），卒于元宪宗元年（1251），在受教于丘处机之前，前后拜于马钰、刘处玄门下，之后从王处一、郝大通处获教甚多，是公认的第三代中的佼佼者。李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出生于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卒于元宪宗六年（1256），他先业儒，后入道，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入丘处机门墙，第二年即随丘西行，成为十八弟子之一。李志常后来成为全真教掌教宗师，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天份和自身努力，更重要的是，为期三年的西行是他前半生经历的重要砝码。

元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召请丘处机^⑤。由于此前丘处机已拒绝金、宋之请，刘仲禄不知丘处机此时态度，为此他多方求助与丘处机关系密切之人。关于丘处机之最终决意西行，目前所见史料有两种说法。一为刘仲禄先赴尹志平传教所在的潍县，希望借助尹志平说动丘处机。尹志平虽为丘处机弟子，但二人并不同在一处，自（金）承安年（1196—1220）起尹志平即于潍阳（今山东潍坊）玉清观修行。由有关碑刻资料，丘处机决意西行，尹志平的意见似乎起了推动作用：

先是，金宋交聘，公（丘处机）坚卧不起。至是师（尹志平）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首肯，决意北觐^⑥。

考尹志平之意，“开化”指规劝成吉思汗，制止蒙古军队滥杀，“度人”指发展教团，这两个任务中，重中之重是教团的发展。尹志平长期在潍县传教，深知发展教团有收拾人心之功效。

第二种说法则是刘仲禄先见李志常，并在李志常引见下见到尹志平：

仲禄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长春今在海上，非先见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潍阳，谒师于玉清丈室，见其神采严重，不觉畏敬，自失从容，语及诏旨，师大喜曰：“将以斯道觉斯民，今其时矣。”遂偕往观长春真人于莱州昊天观^⑦。

李志常一年前才入丘处机门墙，其对丘处机的影响自然不及尹志平。由此事看出，只有通过尹志平才能见到丘本人，不仅说明尹在丘心目中的地位，同时说明此时的李志常在教内的地位远不如尹志平。此事于《长春真人西游记》未载，仅记刘仲禄“次潍州，得尹公”^⑧，因此第二种说法恐有附会之嫌，当是后来李志常友人及门人弟子为抬高其在教内影响的附会之说。

对于应诏西行可能带来的结果，此时的丘处机尚不能确定，但多年的宗教实践使他认识到不依国主教事难成，以前全真诸子应金帝之请带来的教团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此次西行也许是全真教发展的大好时机，也许会无功而返，毕竟对已 73 岁高龄的丘处机来说，万里远行更是一个挑战，这也是丘处机抵达燕京后迟迟不愿北上的原因。元太祖十五年（1220）十月，成吉思汗发来由耶律楚材撰写的诏书：

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子西行，或化胡而成道^⑨。

这份诏书以老子化胡之典激励丘处机西行，只是这时无论是草诏的耶律楚材还是应诏的丘处机都未意识到“胡”不仅可以指佛，也可以指胡人，而这时的胡人就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人。此化胡一说几十年后终为全真教的衰败埋下伏笔。

辛巳年（1221）二月八日，丘处机带领 18 名弟子离开燕京开始了艰难西行。壬午年（1222）三月十五日，丘处机留尹志平于邪米思干（《元史》作撒马耳干，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自己又西行将近 20 天，于四月五日在塔里寒行宫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⑩。此次之所以未携尹志平同行，应该是出于丘处机的谨慎，与丘处机无法预料与成吉思汗见面的后果有关，有尹志平在后，如有不测，起码可以为全真教留下复兴的种子。第一次觐见后，成吉思汗继续征伐花剌子模残部，丘处机回到邪米思干与尹志平会合。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丘处机来到大雪山西北麓的八鲁湾川成吉思汗行宫，并于九月十五日、十九日和二十三日分别为成吉思汗讲道^⑪。由于《西游记》没有特意提到第二次觐见某位弟子未与丘处机同行，因此这次丘处机之行是有弟子随侍在旁的，但讲道时弟子并不在场。

1223 年 3 月，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带着掌管天下道门事的荣耀开始了东返的路途。东归途中，丘处机一行在栖霞观与当年留在此地的其他 9 名弟子会合。在居停的几个月时间里，宋道安、李志常等人不仅在此建好

栖霞观，还建起了长春、玉华二会，成为全真教在西域地区传教的开始。6 月，丘处机一行东返，为安全起见，他和弟子分三批分别起程。

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纂志清六人次之……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五人又次之。

由后来全真教历史看，此一安排大有深意。宋道安作为第一梯队之首先行东还，尹志平作为中心梯队与丘处机同行，李志常则作为第三梯队的一员东行。此后全真教的掌教依次为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由此可见三人此时在丘处机心中的地位。

在丘处机一行东返时，发生过一件对李志常来说意义非比寻常的事。还在丘处机居留栖霞观时，“一日斋客四集，师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圈而佩之，仍作诗为谢，师但笑领而已。盖阿不罕之留，弓弦之授，识者知其有付属之意”^⑫。此举后来被李的门人及友人认作是丘处机属意李志常并将其视为接班人的一个佐证。实际上丘处机常以此类言语奖掖后进，宋德方等人也曾受此考语，故此言不足以视为丘处机传位于李志常的凭据，但值得提出的是，李志常在阿不罕山显露出来的才能，无疑在丘处机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

丘处机一行行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⑬。阿里鲜一直以来是丘处机西行时的翻译，对丘处机教团知之甚多，深知尹志平的能力和他在教团中的地位，认为尹志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丘处机的威望。此事说明尹志平此时在教团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在某种时候可以代丘处机行事，非其他弟子可比。

二、道门贵盛：西行归来之全真教

太祖十九年（1224）二月丘处机回到燕京，住持天长观，不久又应行省之请住持原金廷北宫琼华岛旧道观。1227 年 5 月成吉思汗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⑭。此旨使丘处机实际上处于天下道教领袖的地位，全真教隐然成为天下第一大教，教众人数激增，道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影响所及已从陕西、山东地区波及整个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地域，从一个地方性民间组织一变而为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正统宗教团体，燕京成为全真教中心。据元人商挺载：“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⑮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门骤然大兴。这时入教的全真门徒来自不同阶层，虽有一

定数量的士人,但还有很多是“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⑧,他们因战争而遁入教门,名为修道实为保身,名为道士实则凡俗。以此观之,时人攻击全真教收入太滥实有一定道理。

全真门徒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单纯修建寺庵已无法安置四方来人,加之此时北方地区由于多年战火,寺院荒废极多,因此利用佛教寺庙改作道观成为一时之选,拆毁佛像、改寺为观的事屡有发生。一个叫王伯平的全真门徒甚至挂着成吉思汗的令牌驰骋数州,宣称要统管僧尼^⑨。“丘公自往蓟州,特开圣旨,抑欲追摄甘泉本无玄和尚,望其屈节,竟不能行。”^⑩这些举动引起佛教徒不满,身为佛教居士的耶律楚材认为全真弟子违背圣旨,其广度徒众、自出师号、私给观额、毁败佛像、改寺为观的情形皆出于丘处机授意,至少是他没有严加管束。王国维也指出:“虽长春晚节以后,颇凭藉世权以张其教。”^⑪不可否认,全真教此时超乎寻常的发展为它后来与世俗政权和佛教的冲突埋下了伏笔。我们相信丘处机并不是有意如此,但西行归来的无上荣耀和维护教门的私心让他一时之间淡忘了本门的教旨,以及“谦逊似儒,坚苦似墨,修习似禅,块然无营似混沌”^⑫的全真作风。对全真教的自我异化,丘处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事物发展的规律已经不是丘处机的个人力量所能主宰了。从现有资料看,对教团的快速发展,丘处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道众的肆意妄为起码从表面上看不支持,同时也有行动上的禁止。例如他曾在尹志平随阿里鲜赴山东招谕时付手书一封,委托尹志平约束教门:

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门有妨道化。众生福薄,容易转流。上山即难,下坡省力耳^⑬。

应该是在此时,尹志平与丘处机对教团发展产生了分歧。全真修道早期本是一种信仰或是个人修行之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本,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俭约为常”^⑭。到丘处机时,全真教以立观度人为首要宗旨,成为带有世俗目的宗教,更为普世化更入世的教说取代了以前小规模教团形式^⑮。以道化成天下决定了全真教的入世性质和有为精神,也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世俗,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全真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救世宗教的角色。全真教初创时,有“道伴不过三人,茅屋不过三间”之戒^⑯,以乞食作为生存的基本手段,从王重阳到全真七子皆是如此。金末,随着全真教在华北地区的发展,全真道士建观定居,耕稼谋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基本生活方式由乞食变为耕凿自给。尹志平贞祐乱前主持淮阳玉清观,“领众耕稼,竭力管谷师友,凡二十年”^⑰,成为全真教耕田凿井、推己及人的实践者。西行回到燕京之后,全真教一时之间权力无两,寄生色彩明显,有违其早期自食其力、

安贫乐道的操守,甚至“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⑱。

尹志平对全真教东返后收入太滥,教门因过分兴盛而导致的喧嚣及由此产生的弊端心存疑虑。他日常讲道,强调“平常是道”,“人生于道而能复于道,是不失其常性矣”^⑲,告诫弟子在教门兴盛之际仍要努力修行,不能安享其成而无所作为。作为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不能违背师意,只好以“我无功德,敢与享此供奉乎”^⑳为由退居德兴(今河北涿鹿)之龙阳观,不久后又隐居烟霞观。尹志平的请辞不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在教内也不被众人理解,这在他的《苦辞真人往缙山》诗中有真实反映:“大劫纷纷尚未安,辞师别众铁心肝。道人决裂将何喻,死到头来更是难。”^㉑

这时的丘处机随着年事渐高,也流露出人随天意的情绪。1225年,宣抚使王楙请丘处机主持斋戒,由于王是陕西人,二人聊起终南山、咸阳一带竹木繁茂的胜景,丘处机曰:“今老矣,归期将至,当分我数十竿植宝玄之北轩,聊以遮眼。”倒是王楙尚有解民于倒悬的愿望,他不知一向有为处世、有力挽狂澜能力的丘处机何出此言,“师以杖扣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㉒丘处机的回答说明他已放弃秉持一生的有为入世原则,把民众的苦难看作是不可由人力解决的天命,难怪众弟子听后“莫测其意”。

三、两违之间:尹志平、李志常之择取

据《西游记》载,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一日丘处机因疾不出,二十三日太液池南岸因雷雨崩裂,丘处机自知命数将尽,自疑“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示疾于宝玄,一日数如匱。中门弟子止之,师曰:‘吾不欲劳人,汝等尤有分别在。且匱、寝寢异哉!’七月七日,门人复请曰:‘每日斋会,善人甚众。愿垂大慈还堂上,以慰瞻礼。’师曰:‘吾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后,留颂……葆光堂归真焉”^㉓。

丘处机死后由他的侍者宣布遗嘱:

侍者张志素、武志攄等遽止众曰:真人适有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旧勾当,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

以尹志平当时在教内外的声望,下任掌门非尹莫属,然丘处机不顾教内外意见,安排并不出众之宋道安嗣教,此种做法殊不可解。

宋道安此前事迹不显,在西行门人中入门时间仅次于赵道坚,列第二位,《长春真人西游记》虽载其随师西行,但至阿不罕山时丘处机却将他与李志常等九人留下,与流落在当地的汉人一起建栖霞观。随行与留下的弟子两相比较,走完余下路程的多是追随丘处机多年的弟子,与丘处机关系更加密切。张志松虽也是十八子之一,但一直以来与王志明只是执炊爨之役,倒是下余的宋德方

和李志常是下任掌教的有力竞争者^⑤。在明知宋道安不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将身后教门事托付宋道安，此事的背后必有非当事人不足道的隐忧。

虽已年届 80，但丘处机对自己身体状况仍有乐观的估计，认为一时之间尚不足以致命。自入教以来，丘处机一直是风餐露宿，身强体壮，73 岁高龄还不惮西行，此次也只是痢疾而已，直到七月七日他还认为自己身体状况尚佳，答应门人弟子出席九日斋会。丘处机西行东返时曾在途中患病，“余疾非医可测，圣贤琢磨故也”^⑥，时间不长即痊愈。丘处机这次也是希望有此结果，然而他毕竟是年近 80 的老人，没有料到自己这次会一病不起。

由于多年来的声望以及多次代丘处机行事，尹志平早已是教内外默认的下任掌教宗师，《长春真人帖跋》述陈时可曾见丘处机付尹志平书信数通，述曰：

长春老仙仙去，余适在清安。无名散人问曰：嗣者其谁邪？余答之以清和大师尹公，无名首肯。余鄙人何足以知公，尝闻诸老仙曰：尹公具眼具福，教门事堪付之。但时未至耳，至则圣贤自然推出。今观遗墨数幅，益知老仙许可之□也^⑦。

体会上下文之意，此处漫漶不清之字当为“意”字，由此可知，陈时可等与丘处机关系密切之人从丘处机生前书信中早已认定尹志平是下任掌教的不二人选。李志全《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亦载：“仙翁手泽六帖，墨迹未干，皆是托付后事之实”^⑧，说明尹志平前后多次收到丘处机关于托付下任掌教的信札，在这种情形下尹志平依然不至燕京，甚至在丘处机身故后冒着大违礼教的风险迟迟未在德兴动身，说明他对自己到燕京后会发生的情形早已了然。

丘处机丧事完毕后，事情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转：

继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行祀事，既终七，提举宋公谓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也。”让至于再，清和受其托。

从字面而言，宋道安将掌教之位让于尹志平似是正常的权力转移，大有古人禅让之风，然细考之，尹志平之继宋道安掌全真教疑点颇多。丘处机辞世不久，“提举宋公谓志平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师旨，法名旨事尔代书，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袭之。’”^⑨丘处机将李志常与宋道安并列，赋予李志常为道众书授法名的权力，说明此时的李志常也是丘处机临终时属意的继承人之一，这番话可以说是丘处机另一份遗命。但问题是，若是丘处机属意于李志常，且李当时就在长春观，不存在路远不及嗣位暂由宋道安提举教门事的可能。

张广保认为由于宋道安年龄、资历都在尹志平之上，丘处机因年资之故将宗师之位传与他^⑩，刘晓认为尹志平到燕京后凭借手中的六封手札和三大老证言压服道众，宋道安迫于道内外压力不得已逊位^⑪。如果说丘处机以宋道安嗣位是出于年资上的考虑，有不通之处，全真教

并不是以年资作为接班的依据，同时以此为标准似乎是小看了丘处机的手段。从手札分析，丘处机属意尹志平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过从甚密的教外士人都知此事。之所以以宋道安暂权掌教一职，不过是虚席以待尹志平的到来，因为直到此时，丘处机对尹志平是否肯接掌下任宗师尚无绝对把握。

丘处机对后事的决定有两种可能，一是一时在尹志平和李志常之间无法取舍，因此先安排宋道安为一过渡；第二种可能则是因尹志平不在燕京，先以宋道安为嗣教掌门用以安抚众人，待尹志平归来，再将宗师一位让于他。宋道安掌教不几日就将大位转与尹志平，应该不是宋道安出于压力或私相授受，而是丘处机的真正遗命。其不能说出口的真实意图，是丘处机不想在自己身后由于嗣教原因将弟子分为以尹志平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李志常、宋德方为首的精进派，或者说，此时的丘处机已认可了尹志平对教团发展的认识。

尹志平虽不在燕京，但与丘处机声气相通，经常书信往返，“师（丘）住燕京之日，凡教门公事，必与闻之”^⑫便是这种关系的明证。但丘处机病后，这种经常性的联系似乎有所中断。六月二十一日丘处机即抱病不出，14 天后的七月四日病情渐重，七月九日仙逝。丘处机当时已是 80 高龄的老人，六月二十一日一病，门人弟子不能不为其做身后准备，同时也应及时通知时在德兴的尹志平，即使是为尊者讳不愿谈到丘处机的死后问题，七月四日也应通知尹志平，然尤可怪的是，尹志平在丘处机头七之后才匆匆赶到燕京。此时丘处机生病已 20 多天，距重病至少已经十几日。德兴即今河北涿鹿，在燕京西北 100 余公里处，即使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这样短的距离不应耽搁如此长的时间。因此我们的推断是，尹志平不是不知道丘处机的近况，而是知道了之后依然不赴燕京。尹志平的迟迟不至，与他同丘处机的感情不符，同时也与当时礼教相违。

尹志平不急于奔丧似有难言之隐，从金石材料中可知，似乎尹志平并不打算在丘处机去世后立即前往燕京。贾铉称尹志平“泊长春上仙，众以主教事敦请，遂遁迹于东山”^⑬；弋穀在碑文中亦载“及真人升，师（尹志平）方隐烟霞观，又欲绝迹远遁”^⑭。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尹志平为何头七之后才出现在燕京的原因。

尹志平知道他一至燕京就不可避免地会承担掌教的职责，而事实上他对教门今后的发展没有太大把握。宋道安、宋德方与李志常、王志明、张志素都是当年西行的十八弟子，同门之谊自不待言，但在自己隐居的几年里，他们已成为长春宫的实际管理者。自己远居德兴，在长春宫没有自己的班底，也不知自己关于教团发展的理念能否得到教众的支持。同时，李志常与汗廷的关系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志常是除丘处机外与汗廷关系最密切的人。除此之外，此时的全真教似烈火烹油，受到冲击的佛教徒绝不会就

此甘休，一场冲突将不可避免^②。

尹志平虽然勉为其难做了掌教，但宋道安曾掌教门一事恐已流布出去，教门中人似乎对此有所反应并引发一些波动，“己丑（1229），人欲为梗，窃议主教事□□”。此类事情的发生应在尹志平预料之中，一年之前大葬丘处机于处顺堂就是预先为此类事情张目。全真教对死亡处以达观态度，王重阳说：“无为道者，先舍家而后舍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至死一着抱道而亡，任从天断。”^③赵道坚殁于西行途中，道众东归时欲将其尸骨带回中原却为丘处机所阻，“师曰：四大假躯，终为朽物。一灵真性，自在无拘”。尹志平大葬丘处机于处顺堂，如此乖张造作之举有违他“谦抑自居，淡泊自乐”的秉性与操守，且与全真教力倡苦行自律的初衷相背离。不可否认的是，大葬丘处机一可以增强对教众的感召力，同时厚葬丘处机也有物质许可，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尹志平此举应与三大老和教内高层的推动有关，是对宋道安曾暂领教门事的无奈校正。

尹志平接掌宗师后首先重用李志常，将其从遗嘱中的第六位升至长春宫第二号人物，出任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掌教11年间，尹志平多不在燕京，不是在各地设醮讲经、开觉后进，就是施建道观、修葺荒芜，燕京教门事由李志常摄行，虽无掌教之名但有掌教之实。1230年冬，曾发生过一件有损尹志平形象的事情：

庚寅冬，有诬告处顺堂绘事有不应者，清和即日被执，众皆骇散，公（李志常）独请代之曰：“清和，宗师也，职在传道。教门一切，我悉主之，罪则在我，他人无及焉。”^④

此事的发生，让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尹志平在处理此类事情上缺乏应有的魄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李志常的任事之勇和在教内的实际地位。多年来，李志常以事务性工作见长，和蒙古汗廷保持了良好关系，教内相关事务都由他经手，很早就为朝廷熟知与认可，以致于“虽清和掌教，而朝觐往来必以公，故公为朝廷所知，而屡屡得旨”^⑤。太宗七年，汗廷给全真教的旨意就是同时下给尹、李二人的^⑥。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尹志平掌教期间，对他来说，这种来自于朝廷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是他在1238年嗣教于李志常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1235年金亡，大批士人进入教门，全真度牒成为战乱中的护身符。成吉思汗曾严令禁止窜名道籍，在给丘处机的圣旨中曾要求将冒充黄冠者、隐占差发者告到官司治罪。李志常明知这些人的身份，仍“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⑦，可能是在此时，尹、李之间的分歧表面化了。

戊戌年（1238）正月，尹志平在云中主持斋醮，将大宗师法印交付李志常，李志常正式成为掌教宗师，三月，朝廷封李志常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两年后，尹志平曾致书冯道亨，透露自己有退位之念，劝冯“汝当果敢，时不可不顺”，希望冯担当起下任掌教之

职。然而冯接此书，“乃自念曰：真常摄此行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盖天也，岂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⑧此“真常摄此行事已十年”，说明在尹志平掌教门的11年中，实际的操作者或执行者是李志常，此不惟一般道众知道，连朝廷亦知。

四、结 论

异族入主中原与全真教创建发展相始终是全真教生存的时空背景，丘处机因宗教而政治，终于光大教门。丘处机远赴西域带来全真教的鼎盛，尹志平掌教时全真教鼎盛局面继续发展，在教众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对教团的发展不能不有所节制。到李志常时，全真教已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达到极盛。它的发展引起佛教的抗衡，与佛教的论辩失败后，发展态势戛然而止。

从与汗廷的关系及从长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看，李志常是掌教的最好人选，但尹志平个性谨慎、长于教理的特长也为丘处机所认可。丘处机辞世时，他对教团的发展应该不无忧虑。尹志平也许可以让本门的发展走上更为理性的轨道，同时，尹志平多年来在教内外的声望也是李志常不能与之相比的。丘处机舍李而取尹，说明他对本教的兴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希望在自己身故以后，全真教在尹志平的带领下可以有所更张，放慢扩张的步伐，这是出自对尹志平性格的认识，也是出于对教团发展的良好愿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全真教这驾已由他带入快战车的战车已经由不得他了，即使是尹志平也无法克服它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惯性。在尹志平掌教的十几年间，他与李志常在教团发展认识上的矛盾日益加深，不得已之下，尹志平只得将掌教之职转与李志常，任由这驾战车疾驶下去。

（责任编辑：首之）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页。

② 前贤著作详见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藏外道书》第3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姚从吾：《元丘处机年谱》，《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卿希泰：《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张广保：《尹志平学案》，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6页。余两文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3、251页。

④ 《长春真人西游记》虽署名李志常，但严格说来它是全真弟子集体性的游历回忆录，李志常只是执笔人而已，因为自阿不罕山起李志常就不在丘处机身边。

⑤ 据《元史·丘处机传》，与刘仲禄同见丘处机的尚有扎八儿，另据《元史·扎八儿火者传》，持诏征聘丘处机的不是刘仲禄而是扎八儿火者。关于此人此事，《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金元全真文献无载。考扎八儿当时担任的军职，他的任务很可能是在必要时提供保护，而刘仲禄则担当具体的征聘任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丘处机当时西行有着半被迫的性质。姚从吾认为，扎八儿火者（即扎八儿）

- 之于刘仲禄是协助而不是合作关系（《东北史论丛》（下），第271页）。
- ⑥ 王辉：《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89页（以下简称《金石略》）。赵益认为，丘处机西行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是在半被迫的情形下上路的，但他的上路虽是出于无奈，但是事情成为必然后他也不无自己的考虑（赵益：《丘处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从燕京诗作“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到后来“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可以看到他思想变化的轨迹。
- ⑦ 弋毅：《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金石略》，第568页。
- 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⑧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⑨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化胡说本为夷族所忌，丘处机西行与老子西行化胡高度巧合，甚至给以前更多具有传说性质的化胡说注入新的含意，容易引人联想。蒙元时佛教徒对此十分敏感，对他们来说，化胡已不再是虚构的故事，其所宣扬的道先佛后观正在成为现实。由于全真教的鼎盛，化胡说更激化了佛道间矛盾，把两者几百年来的积怨推向白热化。
- ⑩⑪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13册。
- ⑫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金石略》，第578页。孟攀麟《重修真常宫碑》除此记载外，还引用了丘处机的一段话：“我去之后，能兴大缘，成吾事者，必浩然也。”（《金石略》，第574页）
- ⑬ 《长春真人西游记》。弋毅《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认为尹志平赴山东招谕是出自丘处机的主动敦促，“还及云中，真人闻山东乱，国兵又南下，曰：彼方生灵，命悬砧鼎，非汝莫能救。道遣注招慰，闻者乐附，所全活者甚多”（《金石略》，第568页）。尹志平《葆光集》有《蒙师旨去山东别燕京偶得一绝》诗。
- ⑭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金石略》，第614页。
- ⑮ 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金石略》，第471页。
- ⑯ 《至元辩伪录》卷3载此人为王伯平（《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耶律楚材《西游录》载此人为王道人（向达：《西游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长春真人西游记》载：“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此时成吉思汗正在秦州养病，此处的王志明疑即王伯平（王道人）。
- ⑰ 耶律楚材《西游录》载丘处机“以景州毁像夺寺事致书从乐居士，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向达：《西游录注》，第16页）。
- ⑱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王国维遗书》第13册。
- ⑲ 元好问：《太古观记》引辛愿《灵虚观记》，《金石略》，第482页。
- ⑳ 冯志亨：《创建重阳观记》，见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 ㉑ [日] 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钦伟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 ㉒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㉓ 李志全：《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金石略》，第538页。
- ㉔ 王磐：《创建真常观记》，《金石略》，第615页。
- ㉕ 弋毅：《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金石略》，第568页；亦见贾铉：《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道行碑》，《金石略》，第680页。
- ㉖ 尹志平：《葆光集》，《道藏》第25册，第501页。
- ㉗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载丘处机“顺世之际，据厠而终，其徒释辞，以为祈福”（向达：《西游录注》，第16页）。释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亦载丘处机是因毒痢发作卧于厠中，后来据厠而卒，而不是全真门人所说的无疾而化。
- ㉘ 孟祺：《边缘扶教崇道张尊师道行碑》，《金石略》，第603页。宋道安实际上是全真教在位时间最短的掌教。由于正在丘处机丧中，他似乎并未行承位之礼，故他的地位素不为道教史认可，因此称他为“摄教”更为恰当。
- ㉙ 陈时可：《长春真人跋帖》，《金石略》，第459页。
- ㉚ 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3页。
- ㉛ 刘晓认为，李志全、弋毅、贾铉所撰碑文中均未提丘处机遗命，但全部提及丘处机的六封信札，并将此作为尹志平接任掌教的合法依据（《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谜》，《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51页）。考李志常《西游记》写于丘处机逝世一年之后（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卷首孙锡序），他不能也不敢不如实记录，况且丘处机口述遗命时恐怕他也在场，故此丘处机的临终遗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他们心目中，宋道安只是短暂的过渡，尹志平直接上承丘处机的法统，是毋庸置疑的继任掌教，故此他们的碑文中没有记录宋道安一事。
- ㉜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金石略》，第579页。
- ㉝ 贾铉：《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道行碑》，《金石略》，第680页。
- ㉞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㉞ 弋毅：《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金石略》，第567页。
- ㉟ 释祥迈在《至元辩伪录》中以大量篇幅指斥丘处机和尹志平的种种罪状，却片言不及李志常。
- ㊱ 《长春真人寄西州道友书》，玄全子：《真仙直指语录》卷上，《道藏》第32册，第432页。
- ㊲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金石略》，第579页。道教史料对此事讳莫如深，据景安宁考证，此画是以化胡为题材纪念丘处机的壁画，从蒙古人的角度看，把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画在安葬丘处机的处顺堂不仅不祥，而且是对他们的咒念（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 ㊳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金石略》，第578页。张广保认为李志常是在汗廷直接干预下继位的，同时也因过分热衷蒙古人事务而导致与佛教的争端，此为确论（张广保上揭文，第210页）。
- ㊴ 《玉清宫摹刻圣旨碑》：“癸未年三月御宝曰：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议李志常。”（《金石略》，第447页）
- ㊵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金石略》，第578页。
- ㊶ 赵著：《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金石略》，第521页。